

中国档案学史论

李财富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中国档案学史论/李财富 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5
ISBN 7—81110—070—3
I. 中... II. 李... III. 档案学史—中国
IV. G27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9270 号

中国档案学史论		李财富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印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8438 发行部 0551—5107784	照排	合肥述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开本	787×1092 1/16
责任编辑	徐建 鲍家全	印张	12.25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字数	208 千
		版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110—070—3/D·66		定价 21.00 元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	[5]
第一节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概况	[5]
第二节 孕育时期中国档案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15]
一、研究主体的非专业性	[16]
二、研究行为的无意识性	[17]
三、思想资料的分散性	[18]
四、思想内容的继承性	[18]
五、思想范围的狭窄性	[19]
六、思维层次的经验性	[20]
第三节 孕育时期中国档案学(思想)的主要成就及其对 当今的借鉴意义	[23]
一、提出了一系列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文 献编纂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思想基础,为当 代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23]
二、提出了许多档案管理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管理学的确 立准备了珍贵的思想资料	[25]

三、对档案和档案史料汇编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	[26]
四、在档案库房建筑及档案保护方面积累了许多足资借鉴的经验	[27]
第二章 创立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29]
第一节 创立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概况	[29]
一、关于档案的定义	[29]
二、关于档案的范围	[30]
三、关于档案的作用	[31]
四、关于“档案学”概念	[32]
五、关于档案行政问题	[32]
六、关于档案分类	[34]
七、关于档案立卷(立案、编案、编卷)	[35]
八、关于档案的编目	[36]
九、关于档案鉴定与销毁	[37]
十、关于档案保管与保护	[37]
十一、关于档案的编辑与公布	[38]
十二、关于行政参考资料	[38]
十三、关于档案工作人员的选拔和作用	[39]
十四、关于文书档案连锁法	[40]
第二节 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原因探析	[40]
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 内在动力	[41]
二、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是近代 中国档案学产生的直接诱因	[43]
三、大规模的明清档案整理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产生的 重要助推器	[45]
四、档案教育的创办是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催生素	[46]
五、国外档案学的发展经验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 借鉴	[47]
六、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准备了	

比较充分的思想资料	[49]
第三节 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特点、主要成就 与不足	[50]
一、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特点	[50]
二、近代中国档案学的主要成就与不足	[54]
第三章 发展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61]
第一节 发展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概况	[61]
一、现代中国档案学的产生背景	[61]
二、发展时期的中国档案学研究及其内容	[66]
第二节 发展时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特点、成就 与问题	[76]
一、发展时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特点	[76]
二、发展时期中国档案学的成就与问题	[78]
第四章 停滞与倒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88]
第五章 恢复与繁荣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92]
第一节 恢复与繁荣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概况	[92]
一、现代中国档案学恢复与繁荣的实践基础和外部环境	[92]
二、恢复与繁荣时期的中国档案学研究及其内容	[101]
第二节 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特点	[125]
一、研究范围的广泛性	[125]
二、研究内容的综合性	[126]
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127]
四、研究成果的时代性	[129]
五、研究行为的组织性	[130]
六、理论和观点的抽象性	[131]
第三节 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主要成就	[132]
一、档案学学科体系走向成熟与完善	[132]

二、档案学的学科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134]
三、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全面推进,填补了许多理论空白	[135]
四、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日益细化	[136]
五、中外档案事业史研究不断深入	[138]
六、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成就喜人	[139]
七、档案学术气氛更加活跃,档案学术评论健康发展	[139]
八、建立了档案学科研课题的立项审批制度和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制度	[141]
九、档案学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	[141]
第四节 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存在的问题	[142]
一、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低,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	[142]
二、部分档案学术语(概念)、理论不严谨	[144]
三、在移植和引进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食而不化”、“生搬硬套”现象	[146]
四、部分档案学者对待外国档案学理论不够理智、客观,感情色彩比较浓厚	[147]
五、故弄玄虚,隔靴搔痒	[148]
六、在评价档案学遗产时,部分档案学研究者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	[149]
七、定量分析方法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150]
第五节 现阶段发展中国档案学的若干建议	[152]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	[152]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	[153]
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	[155]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	[157]
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系统	[158]

第六章 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160]
第一节 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规律	[160]
一、档案工作实践的需要是档案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160]
二、结构合理的科研队伍是档案学发展的关键因素	[164]
三、稳定的政策是档案学发展的根本保证	[165]
四、经济、科技、文化是档案学发展的必要条件	[167]
五、中外档案学术与业务交流是档案学发展的外部动力	[169]
第二节 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趋势	[170]
一、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将进一步拓宽	[170]
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将逐步深入	[172]
三、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将不断提高	[173]
四、档案学研究的综合性、系统性将更为明显	[174]
五、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 相互交错、相互转化的趋势将日渐突出	[176]
六、档案学研究将逐步融入国际档案学的洪流之中	[177]
主要参考文献	[179]
后 记	[184]

导 言

列宁有句名言：忘记历史便意味着背叛。对于档案学研究者来说，不了解档案学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规律，其专业知识结构就显得不够完整，就很难真正提高自己的专业理论水平和科研水平，至少不能算是合格的档案学者。

中国档案学史研究始于建国以后。早在 1958 年，新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奠基人、著名档案学家吴宝康教授就在其《档案学专题讲授大纲》中对档案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从而开辟了一个新的档案学研究领域，为该门分支学科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他关于旧档案学（中国近代档案学）的阶段划分、历史特点、学术流派、成败得失等问题的评述，可谓鞭辟入里、精当准确，对以后同类课题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启示和引导作用，并为后人积累了宝贵的思想资料。此后，吴先生又在其编写的我国第一部档案学理论与历史著作——《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中，进一步论述了中国档案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基本特点与经验教训，并对中国档案学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我国档案学界更加重视档案学史的研究，有关各个时期中国档案学（思想）的内容、特点等方面的文章纷纷发表。其间档案学者们还就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分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观点迭出，众说纷纭，一度成为档案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同期出版的档案学教材《档案学概论》、《中国档案事业史》及大型工具书《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分册》等也以不同的篇幅介绍了中国档案学史的有关情况。所有这些都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基础。然而，总的来看，中

国档案学史研究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档案学界的普遍重视,有关中国档案学史的研究成果在整个档案学研究成果中所占的比例仍小得可怜,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全面、系统梳理中国档案学发展历史、评价中国档案学得失成败、探求中国档案学发展规律的专著问世,这与拥有上万名档案科研人才、每年出版几十部档案学著作的、日益繁荣的我国档案学发展形势极不相称,不能不说是中国档案学界的一大憾事。鉴此,笔者拟以此作为自己近几年的首要科研选题,期望能有所突破,为我国档案学理论与学科建设尽自己绵薄之力。笔者深知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课题,因为可以采集的资料少且散,加之本人才疏学浅,对有关问题的评价容易失当。但作为一个多年从事档案学理论学习和教研的档案教育工作者,笔者觉得自己有责任在这方面进行尝试,即使不能成功,也能为大家提供一些相对系统的资料。

中国档案学史研究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看,对中国档案学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完善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丰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考察科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史分支学科,如史学有史学史,文学有文学史,哲学有哲学史等。可以说,是否建立学科史是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档案学从孕育到创建到发展与繁荣,已经走过了几千年的风雨历程,即使从其具备科学形态算起,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是一份厚重而又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凝聚着历代档案学(工作)者、史学工作者、图书馆学者、政府官员,尤其是新中国老中青三代档案学者的心血和智慧,理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和尊敬。著名科学学家贝尔纳说过这样一句话:“在科学上,要懂得今天,征服明天,必须研究过去。”牛顿也说:“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一点,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意思都是讲科学的发展都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都需要借鉴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与经验,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没有继承就不能取得卓有成效的进步。作为科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档案学自然也不例外。要想实现中国档案学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保持其繁荣局面,提升其学科地位,就必须认真研究中国档案学的过去,从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避免或少走弯路。唯其如此,中国档案学才能永葆青春与活力,才能不断地推陈出新,从而名正言顺地跻身于科学之林。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经过广大档案学者的艰苦努力,中国档案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已经摆脱纯技术与经验研究而上

升到理论的高度,成为一门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与学科体系、相对成熟的管理科学。据统计,目前国内档案学者提出的档案学分支学科多达四十余个,其中半数以上已经建成,还有一些分支学科正在构建,假以时日,便能问世。在这种比较有利的学术环境下竟然没有中国档案学史的一席之地,这多少有点不正常。可以预见,随着档案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和细化,新的档案学分支学科还将不断涌现,中国档案学史这门分支学科迟早会应运而生。届时,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将因此而更加丰富,其理论结构与学科体系将更加健全、丰满。

就实践意义而言,研究中国档案学史可以帮助我们反思我国档案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增强档案学理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更好地发挥档案学理论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从而加快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步伐,提高档案的科学管理水平,为社会各项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研究档案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建构档案学理论,即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解决档案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必须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其本质和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高空玄虚”,尤其不能一味地重复“昨天的故事”。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当然,这并不是说档案学研究不需要抽象、概括和理性思辨,也不意味着档案学理论不可以超前,只能对档案工作现象作事后的注解和说明,永远被档案工作牵着鼻子走,而是指档案学研究者要着力于解决档案实际工作问题,不要把档案学变成形而上学(经院之学);要勤于思考,勇于创新,不要盲从轻信,更不要重复别人的错误。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必须加强与档案部门的联系,注重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必须广泛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全面掌握前人和同一时期其他学者的研究情况,如前人是否研究过本课题,有哪些成绩,又有哪些不足,与前人相比,自己的思路、观点是否有进步,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是否可靠等。只有在对已有成果详细了解、充分占有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确定一个选题能否成立,研究的冲动才有可能转化为研究和写作的过程。如果对前人和别人的研究情况一无所知,那么,我们就很难不与别人“撞车”或“炒冷饭”。目前,我国档

案学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且呈蔓延之势,许多貌似深刻实则肤浅、貌似新颖实则陈旧的所谓理论文章被纷纷炮制出来,于理论于实践均无益处可言。这与一些档案学者缺乏独立思考精神、疏于资料收集不无关系。这也从反面说明中国档案学史研究的必要性。

本书拟分成六章展开论述。其中,前五章主要按照中国档案学(思想)的发展阶段,分别评述孕育时期、创立时期、发展时期、停滞与倒退时期及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思想)的发展状况、基本特点、主要成就与不足及其原因,并针对现阶段中国档案学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若干对策。第六章通过对中国档案学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大量现象的分析,揭示档案学的发展规律,并据此预测其发展趋势。本书将以时间为主线,以史实为基础,以观点统率史料,力争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在篇幅安排上,笔者将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论述现当代中国档案学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同时尽量照顾各部分之间的平衡。

第一章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

第一节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概况

严格地说,档案学不是哪一个具体时代的产物,而是历史的积累和发展的结果,其发展是一个不间断的渐进过程。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着七千多年的文字记载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历代劳动人民以其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人类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档案工作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源远流长,举世无双。在长期的档案工作实践中,我国历代档案工作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档案管理经验,为中国档案学思想的孕育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同时也为日后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许多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家在文献整理编纂和史学研究的实践中,熔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历史编纂学及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于一炉,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总结,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据现有资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编纂“六经”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有目的的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和编纂活动,“六经”中的《尚书》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典型的档案文献汇编。春

秋后期,群雄并起,社会动荡不安,周王室“天下共主”的权势不复存在,原藏于周王朝中央的档案大量流散到社会,而许多诸侯国保存的档案也因国家灭亡、宗庙被毁,有的被损坏,有的流失于社会,同时一些世卿贵族历代相传下来的档案也随着其原有的特殊政治地位和权力的丧失而大批外流。宋代司马光描述当时档案流失的情况是“周室微,道德坏,五帝三王之文飘沦散失,弃之不省”。^{〔1〕}档案流散于社会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少数奴隶主贵族对档案的控制和禁锢,使长期积累起来的档案得到较广泛的传播和利用,为这一时期文化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就是这一时期档案得到较充分利用的一个明证。孔子更是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周游天下,遍求各国的档案典籍。《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尚书·纬》载:“孔子求《书》,得……三千二百四十篇……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公羊传注疏》引闵因《序》:孔子“制《春秋》之义,使子夏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这些记载说明孔子和他的学生曾多次到各地广泛收集档案资料。他不仅利用档案设馆教徒,而且整理、编纂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档案文件汇编——《尚书》,编修了我国第一部编年史——《春秋》。

孔子在编订“六经”时主要做了四项工作:一是“考其真伪”(杜预《左传序》),即经过考订将背离事实的荒诞无稽的材料剔除。“六经”主要取自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档案,而上古时期的帝王都崇拜神灵,凡重要活动必先祭神占卜,因而上古档案就出现了“天道鬼神灾祥卜筮”与帝王的人事政治活动“备述于策”的现象。^{〔2〕}孔子不相信鬼神,在整理档案时就把有关“天道鬼神灾祥卜筮”之类的材料去掉了。二是“删去重复”(王充《论衡·正说》),即将从不同途径收集来的重复材料删去。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老《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其实质就是将不同版本而内容重复的材料删掉。三是“存其精要”(梁启超语),^{〔3〕}即以“是否可为后世效法”为标准,经过认真的鉴定,将有较高价值的档案材料保留下来。四是“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即按照一定的体例排列材料并编目。如按年编排《春秋》,按朝代先后和帝王世系编排《尚书》等。

〔1〕《司马温公文集》,第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周谷城:《中国通史》,第10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梁启超:《先秦政史》,第2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通过实践,孔子提出了编纂档案文献的一些基本原则:①“述而不作”〔1〕。“述而不作”语出《论语·述而》。朱熹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2〕意思是,孔子编纂《六经》只是对原有的档案材料进行删、定、赞(简评)、修,尽可能保持原有的文字,一般不改动原文。②“多闻阙疑”,〔3〕“勿意、毋必、勿固、勿我”。〔4〕即多听、多看,保留有怀疑之处,不妄行校改;非改不可时,则应不臆测、不武断、不固执、不主观。③“攻(治)乎异端,斯害也已”。〔5〕即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删除有害(与儒家学说相对立)的见解。④“不语怪、力、乱、神”。〔6〕即将有关怪异、勇力、叛乱和神鬼的档案材料剔除。杨伯峻对此的解释是:“‘力’和‘乱’,孔子所不愿见,可能因此不谈;‘怪’和‘神’可能是孔子‘多闻阙疑’部分,因此也不谈。”〔7〕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对我国档案工作的发展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不仅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历史档案,为后人了解、研究上古社会的发展情况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而且开创了利用档案编纂史书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他提出的档案文献编纂原则,对于日后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自孔子编订“六经”起,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历代相因,连绵不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许多历史学家先后参与档案文献的整理和编纂,并归纳出不少档案编纂原则与方法。其间,还出现了若干专门论述档案管理的学术论文。现择其要者分述如下。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在长期的校订文献实践中,把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文献编纂学融为一体,提出了一系列的文献(包括档案文献)编纂原则和方法。张舜徽先生将刘向校书归纳为以下几个环节:①“广罗异本,仔细勘对”。〔8〕即把一份文献的不同版本尽量搜集齐

〔1〕《论语·述而》。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18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

〔3〕《论语·为政》。

〔4〕《论语·子罕》。

〔5〕《论语·为政》。

〔6〕《论语·述而》。

〔7〕《论语译注》,第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8〕转引自曹喜琛、韩宝华:《中国档案文献编纂略》,第19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全,并加以认真的校勘。②“彼此互参,去其重复”。〔1〕即将一份文献的不同版本互相参照、印证,剔除重复的部分。③“校出脱简,订证伪文”。〔2〕即找出文献中的脱落之处,并对讹、夺、衍、倒等文字错误进行加工。④“整理篇章,定著目次”。〔3〕即对文献进行排列,并编制目录。⑤“屏其异号,确定书目”。〔4〕即每校完一书,撰写“叙录”一篇,介绍作者生平、主要事迹、该书的思想内容、写作价值,以及学术流派和校勘经过。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毕生治史,著述颇丰,其代表作为《史通》。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内容涉及历史观、治史宗旨、史家修养、史学评论,以及历史编纂等许多领域,其中也蕴涵着丰富的史料学和史料编纂思想。刘知几任史官多年,编有大量的起居注和实录,这为其史学理论和史料编纂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刘知几对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和档案文献编纂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在我国历史上,他最早提出了史书与史料的区别和联系。他在《史通·史官建置》中说:“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雋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史料与史书在性质、要求和作用上的不同,同时也指出了二者“相须而成,其归一揆”的关系。他的这一观点被后代学者所继承,并经宋代郑樵、清代章学诚等学者的进一步发挥而成为定论。把史料和史书区别开来,对于文献编纂工作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②倡立“制册章表书”。针对当时史籍中言事夹杂,极易造成文章隔断这一情况,刘知几建议:“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5〕即将文书纪传中的制、册、诰、令、章、表、移、檄等档案文件抽出,另外创立一个“书”体,以“制册章表书”为名。这一建议不仅解决了史书言事混杂的矛盾,而且为档案文献编纂开辟了一

〔1〕 转引自曹喜琛、韩宝华:《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史略》,第19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99。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史通·载言》。

个新的途径，以后各朝编纂的《通典》、《会要》、《诏令奏议》实际上就是刘知几所倡议的以档案文件为材料基础的“制册章表书”。^{〔3〕}关于史料的搜集和鉴选，刘知几也有一些非常精辟的论述。他首先强调史料搜集的广博，“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槧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1〕}因此不仅要搜集经书、正史，而且要广泛搜集“编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各种杂史、野史资料，“故学者欲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2〕}同时，他又强调史料鉴别、挑选的必要性。他说：“远古之书，其妄甚矣。”^{〔3〕}如果只考虑史料的广博，而不对史料进行鉴别、挑选，以致真伪混淆、芜菁杂糅，那么编出的史料就如同“鏤冰为壁，不可得而用也，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4〕}

宋代学者司马光主持编修的《资治通鉴》是我国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历史巨著，“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5〕}“简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6〕}不仅如此，该书在史料的搜集、整理、编纂等方面也有着不少值得后人效仿的地方，特别是蕴涵其中的许多重要的档案文献编纂学思想更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的梳理、借鉴和吸收。

司马光的史料编纂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把史料编纂工作与《资治通鉴》的撰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提出了一套严密的编纂原则和方法。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先作丛目，再作长编，最后删削定稿。丛目的制作程序为：先根据《实录》并参照其他史料，将重要史事列出纲目，按年月日顺序排列，称为“事目”。然后广泛搜集史料，在各事目之下注明全部有关史料的出处。在此基础上，将事目下附注的全部史料调出审阅，斟酌其详略，比较其异同，再做出取舍，然后抄录下来并进行排列，这就是长编的制作过程。同时，在长编正文之下注明异说，并说

〔1〕《史通·采撰》。

〔2〕《史通·杂述》。

〔3〕《史通·疑古》。

〔4〕《史通·载文》。

〔5〕《四库全书总目》卷47，第4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6〕《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明取舍的理由。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长编与当今我们所说的史料汇编是同一事物。最后,司马光对长编进行删削润色加工,整个《资治通鉴》的编修便告完成。

在编纂长编的过程中,司马光形成了如下编纂思想:

丛目未成,不可遽然作长编。也就是说,长编必须建立在丛目这个基础之上,如果丛目没有完成,就不要急于作长编。在丛目的两个部分(事目、附注)中,司马光尤其重视附注的编写,要求尽可能做到详细完备,“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1〕

择善而从,兼收并蓄。司马光认为对搜集来的史料应进行鉴别、挑选,首先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具体方法有:①“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2〕②“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轻重”;〔3〕③“若彼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史实者修入正文”〔4〕。其次要兼收并蓄,对那些年月事迹不相吻合的史料及其他异辞或说,不能弃而不顾,而应通过注释的形式加以保留,“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5〕

鉴别、挑选史料应重内容而不囿于形式。从《资治通鉴》所引书目来看,既有实录、正史,也有野史、小说、谱牒、传记、碑碣等,真可谓“兼收并蓄”。司马光认为,史料的内容才是取舍的主要依据,“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6〕

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即对挑选出来的史料严格按年、月、日的顺序编排。对于那些未标时间或年、月、日不详的史料则采取如下处理方法:“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7〕

“宁失于繁,毋失于略”。〔8〕为了保证重要史料不被遗漏,以使删削撰写《资治通鉴》正文时有较大的余地,司马光要求在作长编时把那

〔1〕 转引自曹喜琛、韩宝华:《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史略》,第7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同上。